

韓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天主教政策變化*

涂 京 威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南臺灣專案辦公室研究助理)

摘要

韓戰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奠定對天主教會政策的關鍵年代。中國共產黨建政初期，雖然暗中支持基督新教部分領袖發起的「三自運動」，但是對整體基督宗教採取寬容態度，盼藉統戰工作納入更多支持者。直到韓戰爆發，中國共產黨才針對教會外籍人士及組織、資金、人事做出總體政策，其後對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各種磨難，亦從韓戰期間對待教會的經驗累積發展而成。韓戰促使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外交關係迅速惡化，並因兩國互相經濟制裁，牽連中國大陸境內美國籍天主教會、教會相關資產、教會人員。此外，因為教廷將主張無神論的共產黨視為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大的威脅，並且教廷主張所有教會神職固守崗位，使得中國共產黨將天主教會相關機構及其外籍人員，視作敵我鬥爭下，必須即刻除去的外患。近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強調黨員勿忘初心，高度重視 1950 年代黨的建設與作為，並且對基督宗教祭出多項新政策，致使教會發展進一步受限，與 1950 年代中國共產黨對待基督宗教作法相近。因此，瞭解韓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對天主教會的政策，對於理解當前中國共產黨看待天主教會的觀點，具有相當程度參考價值。

關鍵詞：教廷、天主教會、韓戰、中國共產黨

* * *

註 * 特別感謝兩位審查人的評論和意見，襄助作者釐清問題及豐富本文內涵，由衷感謝。同時，作者也感謝鍾延麟博士、何思慎博士、梁潔芬博士及王韻博士惠予本文修改意見。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壹、前言

韓戰期間，1950 至 1953 年是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建構對天主教政策的關鍵年代（陳聰銘 2016, 239; 梁潔芬 1996, 121）。中共建政初期，定調宗教組織是統戰工作中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因為，擁有數百萬人口的教會組織，對穩定中共執政基礎有正面作用，所以，中共應拉攏轉化天主教會，不能貿然打壓教會組織，（陳永發 2001, 487; 陳聰銘 2016, 222; 侯景文譯 2016, 298）。^①因此，中共建政初期，部分樂觀的天主教會人士，認為中共不至於全面打壓宗教活動。^②

然而，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中共以「美國凍結中國在美國資產」為由，接管美國在中國大陸的教堂、醫院、學校、慈善機關（陳永發 2001, 569），並擴及天主教美國籍神職人員在中國大陸的傳教權利。半年後，1951 年 1 月 17 日中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召集天主教領袖，定調教廷（The Holy See）是帝國主義間諜中心，為美國帝國主義工作，干涉中國大陸內政（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39-240）。教廷與天主教會遂演變成中國大陸「抗美援朝」運動撻伐的對象，並於 1951 年 9 月 8 日教廷駐中國公使黎培里被迫遞解出境到香港（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0-243）。其後，1952 年 10 月黎培里藉為臺北總主教郭若石主持祝聖典禮「留在臺北」，以及教廷正式將駐中國公使館設立在臺北，形成「兩個中國政府對峙」的教廷與中國外交關係，其影響延續迄今。

雖然，中國天主教會在 1960 年代冷戰的國際局勢，以及中共社會主義改造下，最終恐怕仍難以維持教會獨立性，本文討論韓戰對中共天主教政策的影響，似乎過於枝微末節。不過，因為韓戰緣故，中共加速禁止教會及相關組織與外國往來，並要求天主教會斷絕與教廷的聯繫，正好觸碰到天主教會維持聖統制的底線，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韓戰期間中共對天主教政策的變化，當作獨立課題深入討論。

註① 如何思想改造教會，使之有利中共執政，是中共建政初期對天主教會政策的核心，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即指出「為了孤立和打擊當前的敵人，就要把人民中間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金以楓（2000）轉引自 1949 年 9 月 29 日，毛澤東（1949）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談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註② 中共建政初期，天主教會內曾有人認為「只消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與周恩來喝個茶，進行簡單會談，所有事情就可以解決了」（陳聰銘 2016, 239），顯示中共接收領土過程，雖然有零星迫害天主教會的紀錄，然而並沒有因為中共執政，瓦解天主教會在中國大陸傳教的期待。

而且，既往中共與教廷政教關係的研究，多聚焦在美蘇冷戰導致中國天主教會遭受政治迫害的敘事；僅簡化帶過韓戰期間中共對天主教會的做法，甚至參雜許多錯誤的記述，例如，聖母軍與中國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的宗教職務，經常被中共的反宗教宣傳曲解為軍事間諜組織，因此，筆者認為撰寫本文有還原中共與教廷雙邊互動的重要意義。

再者，1950年代初期歷史的重要性，不僅僅奠定中共與天主教的基本關係，近年中共總書記強調黨員「勿忘初心」、高度重視黨的建設與作為，即是參照1949年中共建政到1957年順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這段時間，當時是中共還沒有陷入瘋狂政治運動與災難性經濟改造的美好年代，同時也是中共統戰工作成就的最高峰，民主黨派、民族宗教人士、愛國知識分子與中共齊肩作戰，共同驅逐國民黨政權與英美殘存勢力。近年中共中央因應美中緊張態勢，呼籲黨員參照1950年代政策推動黨管宗教、限制基督宗教發展，本文認為理解1950年代中共宗教政策，有利參照對應當代中共政策發展。

本文章節安排：首先回顧韓戰前，中共對天主教會的政策。其後，藉著分析韓戰時期的中國天主教重要事件，^③解讀中共天主教政策的轉變。韓戰期間，中共為調動群眾積極性及消除內部反抗，決定斷絕教會與外國的聯繫，促使教會為獲得資源而與中共執政相配合，所以，中共針對基督宗教界政策，主要圍繞著「反帝國主義」進行。然而，韓戰期間，韓國天主教會對美國軍隊提供資訊，影響中共與美國交戰過程，因此，中共遂以帝國主義者對待教廷，以相同作法驅趕美國和教廷對中國大陸教會的影響力。

貳、文獻回顧

梁潔芬（1996）、陳方中、江國雄（2003）、金以楓（2010b）、陳聰銘（2016）等著作，都有專章討論1950年代韓戰期間，中共天主教會政策的變化。梁潔芬（1996）專注中共宗教政策及其共產主義「反宗教」理論，描述此時期中共對天主教會軟硬兼施的作法，並就驅逐外籍神職人員、鬥爭修女院等事件，列舉部分指標性案例。陳方中、江國雄（2003）著重在國民政府的外交措施、教廷

註③ 韓戰時期中國天主教的重要事件，包含韓戰爆發及「抗美援朝運動」興起、天主教界「三自運動」、清算教會組織在中國資產及切斷教會金援、鬥爭聖母軍及修女院育嬰機構、驅逐教廷公使黎培里等重要事件等，本文將依序描述及分析。

對國民政府的回應等面向，描述此時期教廷與國民政府外交關係的轉變。金以楓（2010b）則是以《人民日報》史料，研究此時期中國大陸宗教界的「反帝愛國運動」，描述中國大陸「抗美援朝」運動的發展條件與事件進展。陳聰銘（2016）以《解放日報》、國民政府外交部電文佐證，描述中共天主教會政策的形成，以及教廷公使遷臺過程始末。

前述文獻資料豐富，單一文本都能看到在面對韓戰時期，國內與國際兩個快速變動社會條件之下，教廷與天主教會在中國大陸福傳（evangelization）的困難。然而，前述文獻作者泰半採取教廷，或國民政府，或中共之單方面視角描述這段歷史，交相比對，其實單獨文本仍有其不足之處，或者僅描述部分事件，並未有全面性的歷史整理與描繪。因此，對於描述韓戰期間中共對天主教會政策的變化，筆者認為仍有重新比對整理之條件，並且，放在當前美國與中國共產黨再次對壘對抗的情境下，韓戰期間中美交戰下，中共對天主教會的看法及政策，實可作為當前中共政策的相應對照。

其他文獻，雖未針對韓戰期間中共對天主教政策變化進行研究，不過亦對中共反對教廷對天主教會管轄提出解釋，惟與本文提出之論點略有不同。Tso Yi-En（2011）從天主教會的傳教背景指出，19 至 20 世紀間，西方列強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天主教與其傳教士也從這些條約中獲益，導致中國民眾認知到教會是外國侵略者的盟友，而非中國人民的朋友。前述歷史背景，為主張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提供歷史和文化條件，展開對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衝突與鬥爭。Lan T. Chu（2013）認為是因為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互斥，所以，中共把以教廷為首的天主教會，視作人民的鴉片（opiate of the masses）甚至是西方帝國主義宗教。

Lawrence C. Reardon（2018）則是具體指出，兩大因素導致中共對境內天主教會的排拒與不信任。首先，1950 年代，中共菁英選擇以史達林詮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t-Leninism）來建立領導體系，這套體系要求全面滲透和掌握國家的每個面向，宗教組織也不例外。其次，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在中國大陸建立 20 個教省（ecclesiastical region）管轄的 79 個教區（diocese）和 38 個宗座監牧區（apostolic prefecture），其中八成均由外籍神職擔任主教；縱然教宗庇護十二世於 1949 至 1955 年間新任命 18 位中國籍主教，仍舊無法解消中共質疑「天主教會受到反共產主義外籍人士控制」的疑慮。^④

註④ 劉志慶（2017, 42）針對中國大陸天主教教區是否派遣中國籍主教的問題，引述時任駐中國宗座代表剛恆毅的評論指出，「天主教在中國歷經三個世紀，全體五十餘主教仍然清一色都是外國人。天主

Jennifer E. Walsh (2014) 則總結中共在 1950 年代的宗教政策，指出這些政策核心是為解除宗教團體——特別是由外國資助的宗教團體——對中共潛在的政治威脅；中共針對天主教會，則要求當地教會中斷與教廷的聯繫，獨立辦理教會組織、撰寫教會法以及解釋神學內涵等工作，藉由教會獨立自辦換取天主教會在中共治下合法傳教的權利。

前述文獻雖然解釋中共對天主教會排拒的背景因素及可能原因，然而，文獻並無說明，中共建政初期與韓戰爆發後，促成中共對天主教政策轉折的因素是什麼？教廷向來對主權爭議國家及事件採「中立原則」，為何會遭中共指稱「與美國帝國主義勾結」？中共建政初期爭取各國外交承認，中共為何忽視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的外交官身分，僅將黎培里視為「摩納哥僑民」？本文認為，韓戰及抗美援朝運動是影響中共建政後，天主教政策的關鍵因素，因此本文將中共天主教政策之回顧，主要著眼在韓戰期間的變化，並且，透過中共在韓戰期間對天主教會的諸項政策回應前揭問題。

參、國共內戰至韓戰前夕，中共對天主教會的政策

1946 年 4 月 11 日教廷在中國大陸正式實施聖統制（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00; 陳聰銘 2016, 191），^⑤並於同年 7 月 4 日在南京設立使館，派黎培里（Antonio Riberi）擔任首位駐中國公使（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03-205）。^⑥教廷時任教宗庇

教在中國人眼中成了外國進口貨色，又常與外國政治利益發展關係」，顯現當時外國籍與中國籍主教人數的不平衡狀態。劉志慶（2017, 45）亦指出，「在傳教實踐中，由於修會利益之爭，以及外籍教士對中國籍神職的排斥，對教廷加強本土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如何落實到具體的傳教工作中也有諸多障礙」，劉志慶特別指出因為外籍修會「不願意放棄富裕的堂口（區）」，使得「修會利益」變成教區管理造成的阻礙。然而，按照天主教聖統制，修會（order）既不是教會，教區也不是修會的資產，因此，當時教區本土化的問題，似乎埋日後中共利用天主教內部矛盾作為工具的槓桿。

註⑤ 陳聰銘（2016, 34）指出，聖統制（ecclesiastical hierarchy）是指天主教會內的聖秩階級、教權制度或教會的領導階層。中國大陸聖統制的成立，是指正權主教經教廷委派後，當地教會教士階級制度的成立；主教的治權來自聖統制，所管理的區域稱為教區（diocese），主教屬下的神父所負責的個別教堂則稱為堂區（parish）。

註⑥ 有關黎培里公使簡介，陳方中、江國雄（2003, 203）曾詳述介紹，「黎培里為摩納哥籍，父母均為義大利人，生於 1897 年，1922 年晉升司鐸，轉學於羅馬額我略大學，獲有教會法博士學位。被選入教廷外交學院，畢業後於 1925 年派往玻利維亞、愛爾蘭等教廷大使館擔任館員，1934 年升任教廷駐東非英屬殖民地宗座代表，領主教銜。1939 年歐戰爆發，義大利對英宣戰，英殖民地政府要求黎培里撤退，黎培里乃返回羅馬，任教廷救濟外國僑民事務所主任，訪問被義大利集中之各國僑民，

護十二世（Pius XII），^⑦恪守教廷外交的「中立原則」，^⑧面對全球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擴張，制定「堅守崗位」政策，致力保護地方教會及傳教權利。然而，教廷當時反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也等同與共產主義政權站在敵對面。因此，縱然教廷依循其外交原則在國際衝突秉持中立，教廷仍因其顯著的反共立場，使得教廷在韓戰中被迫捲入美國帝國主義的行列，教廷的反共政治立場同時也波及中國天主教會與教廷駐中國公使的傳教與外交權利。

中國大陸天主教會截至 1947 年，共有 20 個教省、80 個教區、38 個宗座監牧區。全中國約有教友 300 萬、神父 5000 位、修女 6133 人、修士 1260 人，天主教友約占全中國人口約百分之一；另設立 4450 所各級學校、216 座醫院、800 間診所、264 所育嬰機構（劉志慶 2017, 26; 侯景文譯 2016, 295-296; 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01; 陳聰銘 2016, 248），對中國大陸民間社會有相當程度影響力。^⑨

國共內戰時期，中共軍隊在河北省楊家坪以「反革命罪」肅清天主教熙篤會士、在察哈爾省鬥爭天主教西灣子教區（梁潔芬 1996, 108-110; 侯景文譯 2016, 297-298），造成部分天主教會教區的損害。然而，前述壓迫教會僅是零星事件，1948 年末，中共反而對外宣告「信仰自由」，釋放被監禁的神父及發還沒收的教堂（侯景文譯 2016, 298）。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外國傳教士，已在我解放地區者，容許其繼續居住，執行業務；新來者暫不批准」；9 月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入城部隊遵守城市紀律的指示〉規定「（中共軍隊）沒有命令，不准進入教堂」，此時期中共政策保守，反而在宗教

直至被任命為駐華公使」。陳聰銘（2016, 194）則指出，「黎氏曾在英屬肯亞擔任宗座代表，但是 1940 年 6 月 10 日義大利向英、法宣戰，使英國在非洲殖民地的利益也受到影響。於是英國要求教廷撤換教廷派駐肯亞的代表和秘書共三人，理由是他們隸屬敵國國籍人士。……黎氏並非義大利籍，而是摩納哥籍，同時也具梵蒂岡國籍。此次事件顯示出教廷使節在面對當地政治變遷，需堅守中立、不偏頗的原則」。

註⑦ 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於 1939 年 3 月 2 日就任，任期直至 1958 年 10 月 9 日逝世為止。教宗庇護十二世任內經歷 1942 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946 年派任黎培里赴南京出任公使、1946 年設立中國聖統制並擢升田耕莘主教為中國首任樞機主教，渠在任期間，相關政策對中國天主教會發展有關鍵性影響。

註⑧ 教廷外交的中立原則，主要繫於教廷與義大利簽署的〈拉特朗條約〉（Lateran Pacts of 1929）第 24 條「不介入國際間的臨時競爭及與該競爭相關的任何國際會議……梵蒂岡城也將因此被國際視為永久中立和不可侵犯的領土」之國際條約，雖然教廷並未因此條約而被視作國際法上的永久中立國，然而，教廷外交長期恪守中立原則，避免在主權爭議朝和平發展前任意支持單方政權。

註⑨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國籍主教牧養的教區，縱然已領銜南京、北平、上海、南昌、廣州等重要教區（侯景文譯 2016, 295），然而中國國籍主教仍只占 138 個傳教區中的 24 個教區，分布在 12 個教省（劉志慶 2017, 41, 48），埋下日後中共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其一潛藏目標。

政策靈活處理，目標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有利中共建立執政基礎（陳聰銘 2016, 221）。

中共邁向執政初期對天主教會的負面影響輕微，主軸圍繞統戰與分化天主教會內部勢力，尚未展開對天主教會的全面壓制。中共中央籌備建國工作，中共亦邀宗教信仰者共商國是，1949 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共 662 名代表中有宗教界 7 名代表參與其中，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其中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正式將「宗教信仰自由」載入憲法（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5-6, 8; 金以楓 2010b, 107; 梁潔芬 1996, 118）。

1950 年 3 月，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針對基督宗教團體統戰工作做出指示，「應通過其中的進步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積極團結其中的中間分子和落後群眾，孤立少數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服務的分子，從其內部展開民族民主覺醒運動」。而時任中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總結會議，明確對基督宗教提出要求，「我們只反對帝國主義，不牽連宗教信仰問題」（金以楓 2010b, 108; Tso 2011, 5）。中共將基督宗教與帝國主義國家做出切割，^⑩要求基督宗教在中國「自立門戶」，團結宗教信仰者，^⑪以此呼應「共同綱領」在「總綱」中明訂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10）。

中共建政初期的「信仰自由」策略，反應當時中共為應對政治秩序尚未建立、經濟秩序尚未恢復前的局勢，不宜樹立過多敵人，而將注意力集中在解決國民政府留下的經濟社會難題（陳永發 2001, 487; 侯景文譯 2016, 298）。^⑫透過對內對宗教

註⑩ 金以楓（2010b）研究指出，中共建政初期，考量美國於內戰時期對國府的支援、美國百年來對中國的文化滲透、中共「一邊倒」蘇聯的外交政策，美國遂為中共戰略上的主要敵人，「反美國帝國主義」為保衛中共革命果實的必要作為，所以，此時所稱帝國主義，主要係指以美國為主的外國勢力。

註⑪ 《人民日報》（1949）刊出〈信天主教不應做為開除出農會的條件〉，其中談到「民主政府允許人民信教自由，對一般盲目信仰宗教的群眾，應以啓發教育的方式提高他們的覺悟、逐步地把他們從迷信與無知中解脫出來，而不是強迫命令地停止他們參加群眾活動。希望肥鄉一區注意糾正。」可作為此時期中共對天主教政策的註腳。

註⑫ 穆啓蒙和陳聰銘對此時期中共對天主教政策觀察，有雷同觀點，同樣指出中共認為此時期「不宜樹立過多敵人」，然而，穆啓蒙、陳聰銘與陳永發對於「中共為何採取相對溫和的做法」有不同詮釋。穆啓蒙認為，此時中共正要「解放江南」，因此不宜多樹立敵人，應當優先處理比天主教更重要的

團體的統戰工作，消弭可能的反對勢力，對外則是營造出中共備受歡迎的形象，有利於中共穩定政局，所以此時對宗教人士相對採取寬容的政策（梁潔芬 1996, 116）。然而，中共應該如何對待教廷及天主教會，建政初期中共中央做法較為彈性（陳聰銘 2016, 239; 梁潔芬 1996, 119）。

肆、韓戰時期，中共對天主教會政策的變化

1950 年 1 月 5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發表聲明指，美國無意在臺灣獲取特權，不以武力干涉中國局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66-67），宣布「朝鮮和臺灣不在美國西太平洋軍事保護範圍內」。北韓領導人金日成遂藉此說動蘇聯支持朝鮮半島統一，並於 6 月 25 日發動韓戰（陳永發 2001, 550）。韓戰爆發後，美國立即於 6 月 26 日調整對朝鮮及臺灣政策，調動駐日本美軍以武力介入韓半島戰事，派遣駐菲律賓海軍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66-67）。

同年 10 月中共被迫調整原本全力「解放臺灣」的戰略目標，10 月 19 日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介入韓半島戰事，正式與美軍交戰。隔（20）日，中共當局發起「全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簡稱抗美援朝運動），並於 26 日成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負責領導抗美援朝運動（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74, 79-80）。抗美援朝運動的開展，揭開中共天主教會政策的新面貌，翻轉天主教會在中國大陸的處境。^⑬

因為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中共被迫加快整併外國宗教的速度，必須將基督宗教納入管轄範圍，或是驅逐出境，因此，中共的天主教政策方向愈趨明確（陳聰銘 2016, 239），1951 至 1955 年間，中共對天主教會的總體性政策逐漸形成（陳聰銘 2016, 242）。雖然從日後冷戰局勢來看，中共以「國際路線」判斷宗教敵我

事。陳聰銘則認為，此時中共高舉宗教信仰自由，係因建政初期須團結所有可供利用的力量，以對抗主要敵人，並且避免建政初期立即招致人民團體的反對或阻力（侯景文譯 2016, 298; 陳聰銘 2016, 222）。

註⑬ 感謝審查人的評論協助指出，韓戰是中共加快腳步整肅天主教會的催化劑。事實上，國共內戰後，中國大陸百廢待舉，中共將重心放在黨的建設及統一戰線，為求順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中共結合民主黨派、民族宗教人士、愛國知識分子「相濡以沫、同舟共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一起驅逐國民黨與英美殘存勢力，若非韓戰爆發、美中交惡，天主教應該不會這麼快與「帝國主義」劃等號，並遭到中共愛國主義運動的驅逐。

分別的基本立場，天主教會最終定然會在冷戰局勢下，受到整肅納入中共統戰部領導愛國宗教的「特殊隊伍」（王韻 2015, 82），然而，韓戰的爆發則是促進中共加快收納天主教會的腳步，韓戰是中共宗教政策的催化劑。

一、羅馬教廷、天主教會與「帝國主義」

韓戰爆發前，基於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⑭中國大陸已籠罩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輿論浪潮。然而，天主教會及天主教友對「反帝國主義」反應相對冷淡，「從新中國籌備之初開始，好像就不大聽到天主教界的聲音」（金以楓 2010c, 139）。^⑮這個情勢直到韓戰爆發後，才有所變化。中共利用韓戰強化中國大陸「反帝國主義」的愛國熱潮，這使得與外國保持聯繫的基督宗教團體，變成輿論攻擊的主要目標，藉此中共將基督宗教收納在中共的掌控之下（Li and Li 2014, 16）。

1950 年 11 月 5 日，中共派軍進入朝鮮半個月後，《人民日報》刊出文章稱，美國已建立「美國—梵蒂岡聯合情報中心站」，透過梵蒂岡派駐朝鮮的天主教會，進行「間諜活動」。^⑯同月 28 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奧斯丁（Warren Robinson Austin）發表演說，以美國天主教與基督教團體在中國大陸從事無數慈善活動為例，「美國的捐助一直是天主教教堂在中國三百二十所孤兒院所需經費的主要來源。……有二十五萬以上的中國學生曾在美國在華資助的小學和中學畢業」，呼籲中共基於「中美友誼」將軍隊撤出韓半島。^⑰美方此舉沒有獲得中共正面回應，反而落入中共口實，稱「美國藉著經濟優勢，使中國人爲帝國主義者的文化政策所收

註⑭ 毛澤東在 1949 年春夏之間，先後提出「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等三條外交方針（林蘊暉等人 1999, 21）。所謂「另起爐灶」即爲「對國民政府與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一律不予承認，將駐在中國的各國使節只當作普通僑民對待，而不當作外交代表看待」；「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則是在中共中央「不急於取得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承認」的基本立場上，要求「把舊中國與外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和協定重新審理，把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勢力和特權逐步肅清，然後再考慮建交問題」；「一邊倒」則指中國大陸全面倒向社會主義陣營，學習蘇聯制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21-22; 林蘊暉等人 1999, 21）。前揭中共中央與外國建交的原則，在 1949 年 9 月的第一屆「政協」即透由「共同綱領」擬定予以法律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22）。

註⑮ 《人民日報》1940～1950 年有關「梵蒂岡」、「天主教會」的報導，多數係關於外國共黨及梵蒂岡在當地主張反共之消息，此外則係關於擁護國民政府而被中共視爲頭號要犯的于斌主教、美國領銜下的基督宗教對中國的滲透等面向，較少有直接評論教廷與中國外交關係、國內天主教會愛國運動的消息。

註⑯ 內容引自《人民日報》（1950b）。

註⑰ 陳聰銘（2016, 240）轉引自《解放日報》（1950）。金以楓（2010b, 137-138）轉引自《人民日報》（1950c）。

買，而失掉他們的民族精神」，美方的說法，連帶牽連天主教及基督教會（陳聰銘 2016, 240; 金以楓 2010a, 78-80）。

1950 年 10 月，美中兩國在韓半島交戰；1951 年 1 月 4 日中共解放軍攻占漢城、1 月 13 日聯合國提出停戰建議，中共解放軍贏得勢如破竹的勝利，鼓動中國大陸國內反美情緒高漲（梁潔芬 1996, 113; 劉建平 2008, 71）。1951 年 1 月 17 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藉著國內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在北京召集 40 位天主教領袖開會——其中多半僅是教友——周恩來稱，「有許多外國傳教士以傳教之名，實際擔任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工作，這些反革命分子，如果不從教會中清洗出去，勢必危害教會的存在。……正由於帝國主義分子長期操縱著羅馬和美國天主教的高級機關，並在中國長期內參養了像于斌之流的罪惡昭彰的反動陰謀家，來控制中國天主教的教務，中國天主教的愛國運動的發展，就不能不經過激烈的鬥爭……」（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39-240）。

周恩來下令，中國大陸所有教會慈善事業，不能接受美國援助，並下令一切教會慈善團體與美國脫離關係（梁潔芬 1996, 113）。周恩來主導的天主教會議是中共對天主教政策的關鍵決策時間，因為當時中共解放軍在韓半島戰事勢如破竹勝利，周恩來遂加速要求國內天主教會切斷與美國的聯絡關係。然而，卻也因為天主教及其慈善事業與外國的緊密關聯，此後中國大陸天主教會長期受指使為帝國主義的執行者，並被視為站在共產主義陣營對立面的敵對勢力，直到中共推行改革開放後，中共對教廷及天主教會的態度才有軟化。

二、對天主教友組織「聖母軍」羅織罪名加以解散

1950 年 10 月，中共發起抗美援朝運動後，隨即宣布「聖母軍（Legion of Mary）」為非法的間諜機構，要求所有聖母軍成員承認「罪行」，具結切斷與「聖母軍」的關係（陳聰銘 2016, 240-241）。事實上，韓戰爆發後，中共在各地系統性打擊天主教會領導人物及教會團體組織，像是時任南京教區的于斌主教，因為他親近國民政府的政治立場，遂成為中共主要打擊和通緝的對象（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0; 金以楓 2010c, 152），中共希望藉著反帝國主義及抗美援朝運動，促使中國大陸各個教會逐漸瓦解，收入中共掌握之中。

「聖母軍」以組織嚴謹、講求效率、信仰堅定為著稱，遂成為中共亟欲瓦解的主要對象。中共認為聖母軍是秘密的反政府團體，並且認為時任教廷公使黎培里是真正的幕後策劃者（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2）。金以楓（2010b, 157）透過

1950年代《人民日報》回顧指出，當時中共認為「（聖母軍是）1948年時，得到黎培里的親自部署，以後滲入到城市、鄉村的天主教基層」，¹⁸並稱聖母軍的主要活動是「收集情報，散播反革命謠言，破壞人民政府各項政策的實施」。¹⁹縱然聖母軍本身的傳教性質與情報無關，然而，當時教廷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以及抗美援朝運動排外輿論，對於聖母軍成員的舉報和取締，遂成為中共瓦解天主教組織的重要目標。

此外，聖母軍又因為它名稱中的「軍」字，帶有「軍隊」的含義，對中共來說極不悅耳，且具威脅性，因此，落入中共口實，成為韓戰期間，中國大陸輿論攻擊的焦點，最終遭到中共下令解散組織及終止相關活動（梁潔芬 1996, 125; 陳聰銘 2016, 240）。最後，為了不使事態惡化，天主教會只好宣布暫時解散聖母軍（陳聰銘 2016, 240-241）。

三、沒收美籍財產，要求教會團體登記及實行完全自辦

1950年10月美中在韓半島交戰後，美國政府宣布管制中共在美國的公司財產，並禁止在美國註冊的船開往中國港口，對中共實施制裁和封鎖禁運（梁潔芬 1996, 113）。1950年12月28日，中共政務院（2011）發布〈關於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存款的命令〉作為報復。²⁰中共將美國在華財產充公，或交由民間團體經營運用，所有銀行的美國財產均遭凍結。

此外，1950年12月底，中共政務院提出〈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表示要「把一百餘年來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後地、徹底地、永遠地、全部地加以結束」，並於隔（1951）年1月15日發布〈接受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之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

註¹⁸ 陳方中、江國雄（2003, 206）討論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部分，轉引《人民日報》（1951）內容指出「1947年，臭名遠揚的帝國主義分子黎培理，鑑於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形勢的迅速發展，為適應『非常時期』，經羅馬指示，改組成立了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在黎培理直接領導下，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印發了大量反動書刊，並指揮著天主教反動組織『公教行動隊』及『聖母侍御團』進行反革命活動」。其中，聖母侍御團為聖母軍的另個中文譯名，透過陳方中、江國雄（2003）的引文得為金以楓（2010b）稱中共認為「聖母軍受黎培理直接部署」作為佐證。

註¹⁹ 根據中共南京軍管區驅逐黎培理出境的命令指出，中共認為「聖母軍組織的任務，為在我國（中國大陸）各地進行反對人民政府的陰謀活動，包括蒐集情報和組織恐怖事件」（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2）。

註²⁰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 82）原文係指「在美、英等國對華『制裁』和禁運的條件下，黨和政府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方針」。

團體登記實施辦法》，中共中央決定要求「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構和宗教團體實行完全自辦」及「實行登記」，嚴禁學校及文化機構接受外國補助，「教會團體改為中國教徒完全自辦」（金以楓 2010c, 142-14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83; 陳聰銘 2016, 241）。

直至 1951 年 7 月「普查登記」結束後，中共政務院公布〈對於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處理辦法〉，就教會外國財源財產作出指示「外國差會如自願捐出在中國的財產（不包括土地），經政府批准後，中國教會可以接受其全部或一部分，但此項捐贈不得附有任何條件」及「已經實行三自的教會團體，經費如存儲國外而需提回者，須提供確切詳細證據，說明來源及用途，呈請政府審核批准」（金以楓 2010c, 145）。

對於由外國人經辦或接受外國津貼的宣傳、文化、教育、衛生、救濟等機構及教會之看法，中共認為「這些機構雖然有做過一些益於中國人民的事，但有許多在不同程度上起著培植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擴大帝國主義影響的作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11, 28）。金以楓（2010b, 133）指出，根據統計，當時僅美國教會及慈善機關，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總額即達 4,000 萬，該數額超過中國大陸國家貸款。中美兩國間的財務落差，造成兩國間的不信任，而兩國交戰後的制裁措施，更加劇兩國交惡。

中共前揭政策措施，目的在於切斷這些國內機構和美國的關係，特別是切斷經濟聯繫，以作為中共報復美國的相對作為。然而，中共政策的落實，不僅影響美籍組織在中國的權利，同時也殃及各國教會、教會主持的學校、教會的慈善與文化事業，其後更擴及影響到天主教會各國籍神職人員在中國的居留權利。

1947 年天主教會在中國大陸原設有 216 座醫院，然而截至 1951 年底，只剩 10 餘座醫院繼續運作，其餘皆被中共充公。至於座落在 138 個傳教區的 800 間診所，均面對被迫關閉，或是改由中國籍教士或修女主持（陳聰銘 2016, 248），可見此時期中共對天主教政策的壓制力道。

四、羅織神職人員為美國帝國主義「間諜」罪名，並驅逐外籍傳教士

中共在 1949 至 1962 年間，認定當時世界主要的矛盾，是美國與其西歐盟友結成的帝國主義陣線，與前蘇聯及其領導集團所構成的矛盾（梁潔芬 1996, 112-113）。中共為宣傳官方立場，充分利用傳媒與書刊的影響力，發動在眾多報刊中，將傳教士與帝國主義做串連，教會也被視作帝國主義的工具（陳聰銘 2016,

243)。^①

1951年4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文章〈梵蒂岡教廷支持帝國主義干涉國內政的一個鐵證〉;同年4月21日,《光明日報》刊登文章〈梵蒂岡的反動面目〉,兩篇文章都將教廷說成「間諜」中心,負責執行美國帝國主義政策,並且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附和者(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1)。此外,中共宣傳部門將中國大陸各地發行的報刊中,挑選多篇文章編輯整合為文宣書冊,廣泛流傳,像是北津市抗美援朝分會宣傳部編輯的《不能容許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或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揭露美國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罪行》(陳聰銘 2016, 243)。

金以楓(2010b, 135)指出,從中共角度來看,「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危害新中國最現實的威脅,是隱藏在教會內部以教士、信徒身分的特務與間諜」,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的間諜工作,透過傳教士提供情報給外國,用以策劃反對中共。因此,中共為求政權安定,勢必將外籍傳教士驅逐出境。

1951年起,中共下定決心要消除中國大陸境內所有的外籍傳教士,「但為了符合它(中共)的戰術,(中共)絕不扣以傳教的罪名,卻要教徒控訴他們,令他們自認危害國家,在宗教的外衣下,搞間諜的勾當,作美帝的工具,破壞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的仇敵,醜惡的罪人,外披羊皮內藏狼心」(侯景文譯 2016, 306)。同(1951)年5月24日,《人民日報》社論稱,教廷駐中國公使黎培里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黎培里寄給各教區主教的信是「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鐵證,是羅馬教廷干涉中國內政的鐵證……全國愛國反帝的天主教教友們和神甫們應當起來,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肅清出去。」(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1)。^②黎培里嚴格執行教宗庇護十二世「堅守崗位」政策的結果,以及當時代中

註① 梁潔芬(1996, 113)認為,韓戰爆發時,教廷中頗具影響力的美國籍、美國紐約總主教史培曼樞機主教(Cardinal Spellman),與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交情甚佳,可能是中共把教廷列作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其中一個原因。1951年1月9日,史培曼樞機主教抵達香港,慰問難民,所見都是被驅逐到香港的神父修女(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7)。史培曼樞機主教當時在教廷內部的角色?以及,為何會在韓戰期間被教廷派至香港慰問?史培曼樞機主教赴港慰問的作為,似乎將更刺激陷入戰爭的美中雙方,為何教廷仍派,或仍允許史培曼樞機主教訪港,這是本文透過既有文獻未解的一個疑問,尚待未來研究解答。

註② 1950年5月中共總理周恩來策劃推動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隔(1951)年3月31日,在教廷駐中國公使館所在的南京教區,有793位天主教友發出聯合宣言,支持反帝國主義及三自運動。時任公使黎培里見文後,隨即向全中國各教區主教聲明反對本宣言,「今天,三月三十一日,南京報紙登載一篇宣言,據說是由本天主教區的神長和教徒們簽署的,我深為悲痛,並急速通

國天主教會領袖與國民政府的緊密關係，導致黎培里即使恪守南京，最終仍被視為帝國主義幫凶，同樣遭到遞解出境。

韓戰時期，中共有計劃地將外籍傳教士陸續遣送出境，並大量監禁對教宗效忠的中國籍神職、修女及教友（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0; 陳聰銘 2016, 247）。梁潔芬（1996）、劉建平（2008）均主張，「韓戰爆發、美外交惡是造成天主教會受害，促使中共對天主教會政策轉趨激進」的主要原因。梁潔芬認為，「驅逐外籍傳教士純粹是一項政治報復行動」，並指出「（這項報復行動）主要對象是美國籍人，繼而涉及其他西方人。根據政府的指示，所有美國傳教士一律加以嚴懲，其他的可以稍為寬容。」（梁潔芬 1996, 126）。換句話說，驅逐外籍傳教士是中共報復美國的其中一項作為，因此，起初主要驅逐參戰國國籍傳教士，此後才陸續涉及驅逐其他國籍傳教士。

1951 年當年 1 至 12 月，共有 1,238 名傳教士被迫離開中國大陸，其中有 18 位主教、530 位神父、40 位修士、650 位修女。同時，遭囚禁或行動受限制的主教有 22 名和至少 300 名中國籍和外國神父、修女、修士。當時尚留在中國大陸的外國籍者，約有 1,500 名傳教士、100 名修士和 600 名修女；中國籍者約有 2,500 名神父、600 名修士和 5,000 名修女（陳聰銘 2016, 248）。

另按照陳方中、江國雄（2003）的統計，以 1951 年年底為時間橫切面，中國大陸共有 13 位主教被監禁、4 位主教被軟禁監視、9 位主教被驅逐出境，還有 4 位主教被捕後獲釋（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7）。根據梁潔芬（1996, 126），則是截至 1952 年 5 月底，外籍傳教士逾 90% 遭驅逐，僅剩部分「無法查明有罪」的義大利籍、愛爾蘭籍或其他國籍傳教士，繼續留在中國大陸。

中共建政初期，對天主教會的懷柔政策，隨著中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指示，批鬥及驅逐外籍傳教士緣故，中共與天主教會間勢成水火。雖然中共有意運用統戰方法，將天主教友納入統戰旗下，使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工作，但因韓戰導致中共與美國關係決裂，加快中共整肅天主教會的腳步，進而影響中共與整體天主教會的關係（梁潔芬 1996, 127-128）。雖然中共對外籍傳教士，因考慮國際觀感，尚有所節制，多半採驅逐出境待遇，然而，國籍神父、修女的境況就更慘烈，凡不從

知你，宣言製訂時我未曾知悉，我也不能贊同此宣言。我竭力祈求聖神，給一切教友們，尤其給全體神職班，恩賜必要的明悟與勇氣，去明白洞悉和勇敢地戰勝敵人的詭計，為了慈母教會和教宗的尊榮」（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1）。黎培里針對南京教區教友們聯合宣言的聲明，成為中共指稱教廷干涉中國內政的佐證。

命於中共幹部指示的神職人員，幾乎全遭監禁，或未經審判即被殺害、失蹤、餓死獄中（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7）。^②

五、批鬥天主教育嬰機構，藉以驅逐外籍神職人員

1951 年 3 月 9 日，《人民日報》刊登文章，〈南京「聖心兒童院」、「慈愛育幼院」外籍修女殘害中國兒童，廣大人民無限憤怒 政府已採取有效措施〉，該文章稱，由外籍修女主持的天主教南京主教區聖心兒童院和慈愛育幼院，有「虐殺嬰兒情形極為嚴重」的現象，^③並定調育嬰機構之所以出現嬰兒死亡的原因，是帝國主義利用慈善名義，在中國殘忍虐殺幼童（金以楓，2010b，148；劉建平，2008，70-71）。

《人民日報》的定調，引發中國大陸廣州、重慶、武漢、西安、武昌、北京等各地響應（金以楓 2010c, 149、176-189）。^④在中共的宣傳中，各地修女會辦的育幼院都成了殺嬰、虐嬰的中心（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7）。中共認為，以「虐嬰」罪名聲討後遞解出境，是驅逐境內外籍神職人員最便捷有效的方法，遂以「虐待嬰兒至死」的罪名加諸修女身上，而加以控告及作聲勢浩大的公審，最終將他們驅逐出境（梁潔芬 1996, 126）。

中共建政初期，沒有將育嬰機構和其他同樣由教會開辦的教育、醫療等慈善機構作出區別，即使是到 1950 年「三自運動」興起後，育嬰機構問題仍未引起中共

註^② 舉凡，廣東梅縣瑪利諾會的福德主教（Mgr. Ford MM）1950 年 12 月被捕，1952 年 2 月 21 日去世；濟南總主教楊恩寶（Mgr. Cyrillus Jarre）1951 年 10 月 17 日被捕入獄，時年高齡 76 歲，受折磨後體力不支，1952 年 3 月 8 日逝世（侯景文譯 2016, 306-307）。

註^③ 依據劉建平（2008，70-71）引述該文內容稱，聖心兒童院自 1948 年 1 月至 1950 年 6 月，共收養兒童 557 名，其中 372 名死亡，死亡率達 67%；慈愛育幼院自 1949 年 1 月至 1950 年 6 月，共收養嬰兒 242 名，其中 153 名死亡，死亡率達 63%。

註^④ 舉凡，1951 年 3 月 23 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廣州分會，接管加拿大無原罪修女會的聖嬰育嬰院，廣州市公安局拘捕加拿大籍修女潘雅芳等 5 人；4 月 11 日，廣東省湛江市舉報法籍神父和為貴主辦的赤坎育嬰堂及西營育嬰堂虐殺嬰孩案；5 月 26 日，武昌舉行公審，控訴均為美國籍的武昌教區主教郭時濟及副主教徐寶德「在花園山殘害了一萬六千多個中國兒童」；6 月 3 日，廣東省韶關市舉行公審，控訴河西天主教孤兒院虐殺中國嬰兒，要求中共接管該院，並嚴懲義大利籍修女歐美良、達加模、顧慕麗等 3 人；7 月，中共介入調查海口聖保祿育嬰堂虐殺嬰兒案；11 月，廣州市公安局發現，加拿大無原罪修女會的淘金坑育嬰院，設有死嬰坑，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廣州分會派員冒充求職者混入其中偵查，並利用職權偽造嬰兒死亡紀錄，送交公安部門作偽證，隔（1952）年 1 月 4 日，廣州市公安局逮捕淘金坑育嬰院修女，舉行公審大會，以「虐待嬰兒致死罪」將外籍修女遞解出境（梁潔芬 1996, 126-127；劉建平 2008, 72）。

注意，也沒有引起民衆迴響。^⑥直到韓戰爆發後，中共爲報復參戰國，才興起藉由批鬥育嬰機構「驅逐帝國主義分子及帝國主義勢力」的作法，育嬰機構的死嬰事件才被重新提起（劉建平 2008, 70）。

就天主教會而言，縱然當時中國社會嬰幼兒死亡率高（梁潔芬 1996, 127），神職人員辦理育嬰機構仍然有其傳教意義，因爲教會相信，凡嬰幼兒領洗，無論能否順利成長，均有傳教和拯救靈魂的作用（夏其龍 2016, 37）。因此，天主教會各國籍神職人員縱使有天津教案的經驗，仍然持續投入育嬰機構事業。然而，天主教會就傳教目的的育嬰慈善工作，卻在中共面對民衆反帝排外情緒高漲下，被利用爲公審和遞解外籍神職人員，以及接管天主教慈善機構的工具。死嬰事件不再被看成有關天主教會某個堂區或某個神職人員的獨立事件，而被看成外國傳教士藉慈善名義殘害中國兒童的有意之舉（劉建平 2008, 70）。中共藉著到育嬰機構墓地，挖掘修女們收養的棄嬰屍體，控訴神職人員屠殺中國嬰幼兒（侯景文譯 2016, 307），自然成爲中共形塑輿論憤慨，強化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有力證據。

六、以平民身分，遞解教廷駐中國公使黎培里出境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建政後，原本駐守南京、承認國民政府的西方國家使節團，紛紛撤館離開南京。各國撤離的緣故，或因國共內戰戰亂，或者是因爲尚未決定正式承認中共政權，所以暫且選擇撤館離開中國大陸（陳聰銘 2016, 225; 梁潔芬、趙中偉、黃懿縈 2020, 139）。同（1949）年，中共軍隊渡江南下時，僅有教廷公使、蘇聯大使等兩國使節仍然駐守南京（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20）。

黎培里作爲教廷駐中國公使，他堅守南京，並非黎培里個人意志的展現，而是體現當時期教廷對中國外交事務的整體政策。1940 年代，面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擴張，爲保護教會及傳教權利，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制定「堅守崗位」政策，普世適用每個國家，亦即「堅守崗位」一視同仁適用所有國家的神職人員。在天主教會歷史上，這是相當常見的作法，因此，對教宗庇護十二世而言，堅守崗位的原則，幾乎有不容挑戰的神聖性（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16）。^⑦

註⑥ 事實上，中國大陸對天主教育嬰機構冠以「虐待嬰幼兒」罪名，並非中共 1950 年代首創。早在清朝末年 1870 年的天津教案，天津民衆攻擊法國籍神職人員主辦的育嬰院，造成數十名外國人遇害、望海樓教堂遭到焚毀事件，起因即是民衆懷疑修女收留的嬰幼兒，遭到育嬰院殺害死亡（夏其龍 2016, 25）。

註⑦ 教宗庇護十二世擔任駐巴伐利亞王國（Bavaria Kingdom）大使期間，全球處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內亂中，庇護十二世不顧危險，堅守崗位；第二次大戰末期，庇護十二世亦堅守羅馬，未曾離開；

黎培里作為教宗庇護十二世外交政策的執行者，他的政策理念與教宗保持一致（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1）。黎培里除要求各教區主教堅守崗位外，自己也以身作則，當國民政府南遷廣州時，黎培里僅派公使館的美國籍秘書葛理耕（Martin Gilligan）跟隨南下，他自己則堅守南京公使館（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20）。中共建政初期，基於考量神職人員在中國大陸的安全，教廷有意與中共妥協，盼能與中共建立「正式關係」（*relations officielles*），或與中共達成可接受的「過渡協議」（*modus vivendi*），期望藉此保護中國大陸教會及傳教士。黎培里本身亦傾向承認中共，希望藉著他自己留守南京，向中共表達善意，甚至是爭取直接向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呈遞國書，延續中梵關係（陳聰銘 2016, 225；梁潔芬、趙中偉、黃懿綦 2020, 139）。

然而，中共對黎培里的駐守冷漠以對，黎培里苦於無法與中共接觸。不僅如此，當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基於「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等外交方針，向所有駐中國大陸使節發出官方聲明書函，要求放棄承認國民政府、正式承認中共，黎培里是唯一沒有收到該書函的外交使節，黎培里擔憂中共刻意的冷落，是否刻意否定教廷的國際法人資格（陳聰銘 2016, 225-226）。^⑧特別是距離 1929 年教廷從梵蒂岡城國，解套「羅馬問題（Roman Question）」，取得國際法人資格，僅僅 20 年，黎培里對中共刻意忽略教廷外交地位的作法，或有更深層的擔憂。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黎培里意識到這不只是區域性的戰爭，而是肇因於美國和蘇聯的對抗，於是，黎培里將天主教會的中國困境，寄望於韓戰為中國大陸情勢可能帶來的變化。因此，同（1950）年 7 月 2 日，黎培里向參加南京天主堂聖母會區會成立典禮的教友說：「形勢已變，黎明前之黑暗已經過去，今年年底定有變化」，黎培里主觀認定共產政權不可能長期存在，而韓戰將是改變天主教會處境的機會，不過，最終黎培里的期待落空，他這段話也成為日後中共指稱的罪狀之一（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39）。

從教廷觀點來看，無神論的共產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教廷面對最大的挑戰，蘇聯及南斯拉夫迫害宗教的作法，促使時任教宗庇護十二世不得不向共產政權提出抗議。^⑨作為教宗在中國大陸的代表，黎培里自然要執行教宗意旨，既然教

面對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國大陸的擴張，教宗庇護十二世也要求各地的主教們，必須堅守崗位，照顧好自己的地方教會，不畏懼各種挑戰及危險（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0）。

註⑧ 根據國際法，梵蒂岡教廷在政治上享有獨立自主權，所以教宗在梵蒂岡中不受任何國家的左右牽制，而能獨立行使其精神及教會權力（梁潔芬 1996, 124）。

註⑨ 教宗庇護十二世除向蘇聯及南斯拉夫抗議，亦於 1948 年義大利國會大選時，號召有投票權之公民，

宗明白宣示反對共產主義，黎培里也不能採取其他立場（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05）。

1951 年初，黎培里延續教宗庇護十二世堅守崗位的外交原則，向所有中國大陸的神職人員發出〈考驗的時刻（A Time of Trial）〉牧函，敦促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陳聰銘 2016, 244）。然而，黎培里自中共建政以來，基於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外交原則，要求神職人員堅守崗位的作法，卻演變成中共指控教廷干涉中國大陸內部事務的證據，甚至宣稱是帝國主義為進行特務及間諜行為的謀略，更促使中共做出驅逐黎培里的決策。^⑩

1951 年 6 月起，中共文宣攻擊鎖定黎培里個人，羅織罪名，指控他是站在中共及愛國中國民衆對立面的外國敵人。^⑪在輿論發動的抨擊中，完全否認黎培里的使節身分，而僅將他視為摩納哥僑民，並將他歸類為「美國帝國主義分子」，^⑫隨即自 6 月 26 日起，黎培里及教廷駐中國公使館館員受到中共監視，黎培里被中共軟禁在南京寓所內，拘禁期間，黎培里不時遭到長時間疲勞轟炸式訊問（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2; 陳聰銘 2016, 246）。

同（1951）年 9 月 4 日下午 2 時 30 分，黎培里被中共帶至南京公安局，審訊至晚間 10 時，中共最後宣讀南京軍管區驅逐出境的命令。^⑬當晚 11 時，黎培里被 12

要求他們在 4 月 18 日投票選舉願意擁護神聖法律及教會權利之候選人，否則犯良心重罪，在現世選舉中，教宗庇護十二世選擇站在當時可能贏得執政權的義大利共產黨對立面（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05）。

註⑩ 金以楓（2010c, 135）稱，帝國主義危害中國大陸最現實的威脅，即是「隱藏在教會內部以教士、信徒身分的特務與間諜」，並引述《人民日報》（1950a）內文指出，「香港的間諜總部利用國外傳教團體作為週邊組織，供給在中國的『可靠的』傳教士以詳細情報及從事反對中國人民政權活動的指示。各傳教會被指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離開中國……」。由於中共與教廷間外交政策的理解落差，遂使得教廷牧靈所需的「堅守崗位」政策，在韓戰的背景下，被解讀成為美國為首帝國主義提供情報與進行間諜工作的輔助政策，進而演變成中共整肅天主教會及驅逐外籍傳教士的重要因素。

註⑪ 舉凡，指控黎培里「1947 年 2 月 16 日黎培里發布教廷駐華公使館一帶字第 1 號『為公教團體或個人不得參加反動組織』的訓令……」，稱他要求天主教會團體或個人不得參與共產黨的訓令，顯示黎培里就任之初，就是站在共產黨對立面（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05）。另外，陳聰銘（2016, 246）轉引自《解放日報》（1951a）則稱「對於……中國人民正在進行著愛國主義的運動，他（黎培里）卻表現了極端仇視的態度……誓死與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為敵」，原文是指稱黎培里惡意阻止天主教會內推動「三自運動」，顯示黎培里與愛國民衆站在對立面，為帝國主義勢力作勢撐腰。

註⑫ 陳聰銘（2016, 246）轉引自《解放日報》（1951b）。

註⑬ 該命令以三大罪行指稱黎培里，「查本市摩納哥僑民黎培里（Antonio Riberi）係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羅馬教廷』駐中國公使，於 1946 年 12 月來華，一向勾結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堅決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其重要罪行如下：一、掩護外國特務間諜，進行間諜活動。……以宗教職業為掩護，進行反革命間諜破壞活動，並為黎培里連續蒐集和送出關於華北東北軍事情況的情報多

個公安人員押送回教廷公使館，在監視下收拾行李，隔（5）日凌晨，被押至南京火車站，由公安人員押送至上海，9月7日抵達廣州，9月8日抵達深圳，經由公安人員翻查行李做最後檢查後，才准允黎培里進入香港（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2-243; 陳聰銘 2016, 247; 梁潔芬、趙中偉、黃懿縈 2020, 139; 侯景文譯 2016, 306）。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即便因為考量中國天主教會與國民政府的密切關係，中共第一時間不願意與教廷外交接觸，然而，中共剛建交時也沒有直接驅逐教廷公使黎培里。筆者認為，韓戰爆發，教廷在北韓提供美國聯軍情報資訊，以及教廷透過公使黎培里要求中國教友反對共產主義及固守崗位的作法，可能才是導致黎培里遭到驅逐的主要理由。

黎培里被驅逐至香港，離開中國大陸，正式終結教廷使節在中國大陸的派駐，同時也象徵著教廷被迫中斷與實際掌握中國領土之政權的外交關係。其後，黎培里在教廷安排下，於 1952 年輾轉來到臺北，並將教廷公使館遷駐臺北，且於 1967 年 2 月 10 日教廷正式批准、4 月 21 日在臺灣正式成立「天主教中國地區主教團」，遂形塑成當前教廷與兩岸複雜的三邊外交關係，後續效應持續影響當前兩岸與教廷間的政教互動。

伍、結語

中共宗教政策向來重視國際局勢，宗教勢力是否是敵我矛盾是以國際關係來看。中共十八大後，為應對美國及親美西方勢力政治鬥爭的需要，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要求基督宗教中國化、嚴加管理境內外國宗教、緊縮宗教自由，強化「黨管一切」的作法，似乎有轉向毛澤東在 1950 年代訂下「抗美援朝」的鬥爭精神。

中共不僅要求宗教服膺統戰部領導的愛國宗教「特殊隊伍」（王韻 2015, 82），更要求各宗教對共產黨做出更多貢獻，有如韓戰時期「抗美援朝運動」期間，中共對基督宗教壓制和要求。近期美中貿易衝突越演越烈，美國圍堵中國對外發展的國際局勢愈趨明顯；美中衝突的國際局勢，似乎雷同美蘇冷戰時期中共一邊

件。……可以充分證實黎培里在中國間諜活動。二、策劃組織反革命的秘密團體聖母軍。……三、煽動天主教徒反對人民政府。黎培里曾迭次向中國天主教會發布敵視我國人民政府的命令及指示，不准中國天主教徒參與愛國活動和人民政府所領導的活動，……上述罪行，均經查獲確實證據，證實黎培里在本市解放以後，仍以宗教為掩護在我國進行旨在危害我國國家安全和反對我人民政府的非法活動……」（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2-243）。

倒向蘇聯的國際局勢。因此，當前研究韓戰時期的中共宗教政策具有時代意義，可以作為歷史及現在的對照。

韓戰時期，教廷時任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的反對共產主義立場，等同與共產主義政權站在敵對面。因此，教廷縱然依循其外交原則在國際衝突秉持中立，不過因為教廷顯著的反共立場，使得教廷在韓戰中被迫捲入美國帝國主義的行列，教廷的反共政治立場同時也波及中國天主教會與教廷駐中國公使的傳教與外交權利。

雖然，自 1970 年代起，教廷已經取消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並且秉持對話理解的立場，促成教廷與共產國家重修外交關係，逐漸淡化天主教會在國際社會裡的西方色彩。然而，中共一貫以統戰部領導愛國宗教「特殊隊伍」的宗教政策，依舊抵觸全球天主教會聖統制的秩序，天主教「一團一會」的特殊存在，仍是教廷極力與中共磋商的政教問題之一。^④中共宗教政策與教廷聖統制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就任後，強化統戰系統以強化管理宗教的作法，自然更加激化統戰系統與聖統制的矛盾，也埋下當前中共與教廷教務談判頻頻觸礁的因子。

1950 至 1953 年，韓戰雖然僅有短短 3 年，然而，中共在這段時間內，形塑未來長達數十年壓制天主教會在中國大陸發展的總體政策。韓戰期間，天主教會、教廷與美國政府間的密切關係，以及時任教宗庇護十二世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使得中共在抗美援朝、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將教廷與天主教會視為站在中共及「廣大中國人民」對立面的敵我矛盾。韓戰爆發，也促使中共加快腳步要求基督宗教切斷與外國聯繫，並導致中共決定與教廷中斷外交接觸。然而，隨著美國對中國外交轉向圍堵政策，美中冷戰逐漸成形，即便韓戰截至今日已經超過七十年，1950 年代韓戰美中對抗下的中共天主教政策，仍然有其時代意義，可以作為外界瞭解近期中共與教廷談判的對應參考。

* * *

（收件：109 年 7 月 6 日，接受：109 年 10 月 14 日）

註④ 聖統制是指地方教會透過符合《天主教法典》規範之程序，選任各教區主教，並效忠教宗與全球天主教會共融；此外，藉著教宗派任在各地的宗座代表或教廷大使，傳達教宗諭令，要求各地教會在教義、福傳、禮儀等面向與全球天主教會合一。理論上，教宗透過聖統制掌握全球天主教會，並要求各地教會服從教廷中樞決策，教廷與地方教會有直接的聯絡關係。不過，中共藉「一團一會」自主自辦教會，並要求中國教會切斷與教廷的聯絡關係，嚴重抵觸聖統制在中國大陸的運行，若事關嚴重，教宗其實有權宣布中國天主教會「裂教」——即不承認中國天主教會隸屬全球天主教會一員。

The Evolution of Policies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omas Ching-wei Tu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Southern Taiwan Program Office
Research Assistant

Abstract

The Korean War is a crucial inciden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policymaking on the Catholic Churc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me, CCP secretly supported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led by some leaders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Despite this, the CCP has tolerated Christianity and hopes to gather more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It was not until the Korean War that the CCP formulated overall policies concerning the Western Church, including its organization, capital, and human resources.

Furthermore, the Korean War deteriorate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sanctions have led to the detention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Orders, churches, and Christians in China. Additionally, the Holy See proclaimed that the Atheist communism was the most radical threat to the Church after World War II. Also, the Holy See also ordered its clergy to hold on to their posts and stay in their dioceses. Both the proclamation and the order had made the Catholic Church become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wer, and the CCP was eager to overthrow it. As a result, during three years of the Korean War,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was desperately crucified by CCP.

However, there is insufficient literature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during the Korean War period. Therefore, it gave birth to this article. Recently, Xi Jinping, the leader of CCP,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arty-building experiences in the 1950s. He also imposed some new restrictions on Christianity, which are comparable to the policies of the 1950s. Therefore, reexamining the early 1950s policies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s valuable for comprehending recent events.

Keywords: The Holy See, Catholic Church, Korean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參考文獻

- 人民日報，1949，〈信天主教不應做為開除出農會的條件〉，02月02日。People's Daily. 1949. "Sin tianjhujiao buying zuwei kaichu chu nonghui de tiaojian" [The Belief of Catholic Should Not Be the Condition of Dismissing from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February 2.
- 人民日報，1950a，〈美英勾結蔣匪訓練大批特務妄圖利用教會商業組織潛入我國大陸進行破壞，警惕帝國主義間諜活動〉，03月21日。People's Daily. 1950a. "Meiying goujieh Jiangfei syunlian dapi tewu wangtu liyong jiaohuei shangyeh zujhih chianru woguo dalu jinsing pohuai, jingtig diguo jhuyi jiandieh huodo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ollude with Jiang Bandit to Train a Group of Spies Aims at Corrupting Our Country Mainland by Lurking in the Church and Merchant Organization Be Alert to the Imperialist Spy Activities]. March 21.
- 人民日報，1950b，〈美國侵略者利用教會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梵蒂岡是帝國主義的情報站〉，11月05日。People's Daily. 1950b. "Meiguo chinlyuehjhe liyong jiaohuei zai zhongchao jinsing jiandieh huodong, fandigang shih diguo jhuyi de chingbaojhan" [The American Invaders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urch to Implement Spy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Korea the Vatican Is the Intelligence Station for Imperialism]. November 5.
- 人民日報，1950c，〈在安理會和聯大政委會上，奧斯丁與杜勒斯發表無恥演說〉，12月03日。People's Daily. 1950c. "Zai anlihuei han lianda jhengweihuei shang, aosihding yu dulesih fabiao wuchih yanshuo" [In the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and Political Committee Austin and Dulles Declare Shameful Speech]. December 3.
- 人民日報，1951，〈羅馬的天主教教務協進會〉，07月05日。People's Daily. 1951. "Luoma de tianjhujiao jiaowu siehjinhuei" [The Roman Catholic Central Bureau]. July 5.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2011. *Jhongguo gongchan dang lishih, di er juan, di er jua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V.2]. Beijing: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ublishing House.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1950年12月28日政務院發布《關於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存款的命令》〉，<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4856/75017/5195710.html#>，查閱時間：2019/01/21。CPCNews. 2011. "1950 nian 12 yueh 28 rih jhengwuyuan fabu guanyu guanjjhih meiguo zaihua tsaichan dongjjieh meiguo zaihua tsunkuan de mingling" [December 28th 1950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ouncil Issues

- the Order of Regulating U.S. Property in China and Freezing U.S. Deposits in China]. (Accessed on January 21, 2019).
- 毛澤東，194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Mao, Ze-dong. 1949. "Jhongguo renmin jhengjih siehshang hueiyi gongtong gangling" [Comm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d., "*Jianguo yilai zhongyao wunsian syuanbian, di 1 ce*" [Selec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 1].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 王韻，2015，〈宗教市場的國際與國內因素：從兩岸政教關係研究探討一個宗教市場論的新研究架構〉，《中國大陸研究》，58（1）：65-102。Wang, Ray. 2015. "Zongjiao shihchang de guoji yu guonei yinsu: tsong liangan jhengjiao guansi yanjiou tantao yige zongjiao shihchangelun de sin yanjiou jiagou" [Transnational Factors in the Religious Market: Building a New Theory of Religious Economy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State-Religion Relations in Taiwan and Chin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8 (1): 65-102.
- 林蘊暉、高化民、叢進、肖冬連，1999，〈強國的方略：中國五十年社會主義戰略的演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Lin, Yun-huei, Hua-min Gao, Jin Cong, and Donglian xiao. 1999. *Chiangguo de fanglyueh: jhongguo wushihnian shehui jhuyi jhanlyueh de yanbian* [Strategies of the Powerful Country: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Strategies in Past 50 Years].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 金以楓，2000，〈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發展述略〉，《宗教》，2：1-12。Jin, Yi-fong. 2000. "Jhongguo gongchandang zongjiao jhengtse fajhan shulyueh"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ligious Policy's Development]. *Religion*, 2: 1-12.
- 金以楓，2010a，〈五十年代初期宗教界的反帝愛國運動：以《人民日報》為例證〉，金以楓編，《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130-203，臺北市：見證月刊。Jin, Yi-fong. 2010. "Wushih niandai chuchi zongjiaojieh de fandi aiguo yundong: yi Ren Min Rih Bao wei lijheng" [Anti-Imperialism Movement of Religious Circles in the Early 1950s: People's Daily as an Illustration]. In Yi-fong Jin, ed., "*Yushih jyujin jhongguo gongchandang de zongjiao jhengtse*" [Advance with Times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 130-203. Taipei City: Jianjheng Monthly Press.
- 金以楓，2010b，〈早期共產黨人的宗教觀〉，金以楓編，《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的宗

- 教政策》：45-103，臺北市：見證月刊。Jin, Yi-fong. 2010. “Zaochi gongchandang ren de zongjiaoguan” [Religious Perspective of the Early Communists]. In Yi-fong Jin, ed., “Yushih jiyuin jhongguo gongchandang de zongjiao jhengtse [Advance with Times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 45-103. Taipei City: Jianheng Monthly Press.
- 金以楓，2010c，〈新中國宗教政策的政治基礎〉，金以楓編，〈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106-127，臺北市：見證月刊。Jin, Yi-fong. 2010. “Sin jhongguo zongjiao jhengtse de jhengjih jichu” [The Political Basis of New China’s Religious Policies]. In Yi-fong Jin, ed., “Yushih jiyuin jhongguo gongchandang de zongjiao jhengtse” [Advance with Times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 106-127. Taipei City: Jianheng Monthly Press.
- 侯景文譯，穆啓蒙（Joseph Mortte, S.J.）編著，2016，〈天主教史，卷四〉，臺北市：光啓文化。Hou, Jing-wun, trans. Joseph Mortte, S.J.. 2016. *Tianzhujiao shi, juansi*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 4]. Taipei Cit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 夏其龍，2016，〈了解天主教〉，香港：三聯書店。Sia, Chi-long. 2016. *Liaojieh tianzhujiao* [To Know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 梁潔芬，1996，〈中共與梵蒂岡關係（一九七六年～一九九四年）〉，新北市：輔仁大學。Beatrice Leung. 1996. *Jhonggong yu Vatican guansi (1976~1994)* [Sino-Vatican Relations (1976~1994)]. New Taipei Cit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梁潔芬、趙中偉、黃懿綦，2020，〈臺灣天主教研究，卷一〉，臺北：光啓文化。Beatrice Leung, Zhong-wei Zhao, and Yi-ying Huang. 2020. *Taiwan tianzhujiao yanjiu, jyuanyi* [Taiwanese Catholic research, vol. 1]. Taipei: Guangqi.
- 陳方中、江國雄，2003，〈中梵外交關係史〉，臺北市：臺灣商務。Chen, Fang-cung, and Guo-syong Jiang. 2003. *Jhongfan waijiao guansishih* [History of Sino-Vat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 陳永發，2001，〈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冊〉，臺灣：聯經。Chen, Yung-fa. 2001. *Jhongguo gongchan geming chishihnian (sioudingban), shangce* [Seventy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Vo. 1]. Taiwan: Linkingbooks.
- 陳聰銘，2016，〈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1912~1978）〉，臺北市：光啓文化。Chen, Alexandre Tsung-ming. 2016. *Zhongfan waijiaoshi: Liangan yu Jiaoting guanxi (1912~1978)* [The History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Holy See and the China: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Holy See (1912~1978)]. Taipei City:

Guangqi.

解放日報，1950，〈奧斯丁與杜勒斯為美帝侵略行為狡辯，並惡意侮辱中國人民〉，12月03日。Jiefang Daily. 1950. “Aosihding yu dulesih wei meidi chinlyueh singwei jiaobian, bing eyi wuru jhongguo renmin” [Austin and Dulles Argue for the Invasion by American Imperialism, Also Malicious Insult on Chinese People]. December 3.

解放日報，1951a，〈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怎樣反對中國人民的？〉，06月09日。Jiefang Daily. 1951a. “Diguo jhuyi fenzih lipeili zenyang fanduei jhongguo renmin de” [How Does the Imperialist Riberi Against Chinese People]. June 9.

解放日報，1951b，〈黎培里怎樣勾結蔣幫，進行反共反人民〉，07月06日。Jiefang Daily. 1951b. “Lipeili zenyang goujiej jiangbang, jinsing fangong fanrenmin” [How Does Riberi Collude with Jiang Gang for Implementing Anti-Communism and Anti-People]. July 6.

劉志慶，2017，《中國天主教教區沿革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Liou, Jhih-ching. 2017. *Jhongguo tianjhuiao jiaochyu yangeshi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tholic Dioces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劉建平，2008，〈虐嬰還是育嬰？1950年代初育嬰堂問題〉，《二十一世紀》，107：69-77。Liou, Jian-ping. 2008. “Nyuehying haishih yuying? 1950 niandai chu yuyingtang wunti” [Baby Abuse or Parenting? Nursery Issue in the Early 1950s]. *Twenty-First Century*, 107: 69-77.

Chu, Lan T.. 2013. “Vatican Diplomacy in China and Vietnam” In Philip Seib, eds., *Relig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p.57-7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

Li, Ma, and Jin Li. 2014. “Remaking the Civic Space: The Rise of Unregistered Protestantism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Urban China” In Joel A. Carpenter, and Kevin R. den Dul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Public Life: Religion,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pp. 11-2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Reardon, Lawrence C.. 2018. “The Pope and Asia: Building Bridges-Reconcili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lynna J. Lyon, Christine A. Gustafson, and Paul Christopher Manuel, eds., *Pope Francis as a Global Actor: Where Politics and Theology Meet*, pp. 215-244.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Tso, Yi-En. 2011. “Reexamine Sino-Vatican Relations: The Triangle Game Between Vatican, China, and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5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Philadelphia, PA.

- Walsh, Jennifer E.. 2014. "The Importance of Gathering Together: Religious Land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Joel A. Carpenter, Kevin R. den Dul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Public Life: Religion,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pp. 57-78.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